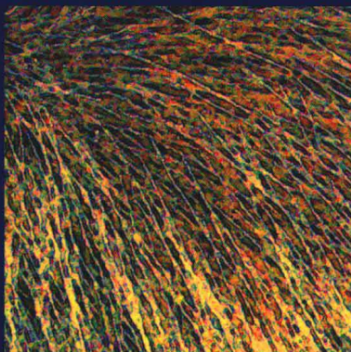


95.11.28

毛時代經濟再評價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布拉莫爾

Chris Bramall

ISBN 0-19-587402-1



9 780195 874020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毛時代經濟再評價

四川：1930—1980s

布拉莫爾(Chris Bramall)著

李小川等譯

吳欽校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5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hris Bramall

毛時代經濟再評價
—四川：1930-1980s
Chris Bramall 著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 19 587402 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紹光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大學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吳 欽 科技與發展·中國發展專刊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前言

本書試圖評價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從南京時期(1928—1937)到1978年開始推行「自由化」(liberalization)政策之間的經濟發展。其中很大篇幅用以討論四川各地區收入和潛能分配的變遷,對大躍進之後的饑荒也有較詳細的討論。但本書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分析和解釋毛澤東主義時代社會制度的成功和失敗。與近年來的定論相比,本書得出了更加肯定的結論。

我非常感謝鮑勃·亞什(Bob Ash)、特里·貝雷斯(Terry Byres)、劉民權(Liu Minquan)和伊恩·麥克弗爾遜(Iain Macpherson)在我寫作過程中所給予的中肯的批評意見和鼓勵;我也得益於阿蘭·休格斯(Alan Hughes)、唐聞生(Tang Wing-Shing)、肯·沃克(Ken Walker)和張訓海(Zhang Xunhai)的建議和指點;另外,第三世界經濟歷史和發展組倫敦會議(1988年9月)(The Third World Economic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Group's London Conference)和劍橋中國經濟研究組(The Cambridge Research Group on the Chinese Economy)也使我受益匪淺。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審稿人使本書增色不少。我特別要感謝彼得·諾蘭(Peter Nolan),他的影響極大,他的熱情極具感染力。如果沒有他,我無法想像如何構思本書,更不用說完成它了。

我還要感謝:當代中國研究所發表了我關於四川的早期論文;遠東和非洲研究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查理斯·迪沃本圖書館(Charles D'Orban of the Library)使我跟踪近期有關四川資料的動態;經濟與社會研究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資助我初期的研究工作,不列顛中心(The British Council)也資助我一年的中國之行;劍橋大學悉尼·蘇塞克斯學院(Sidney Sussex College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院長和同事們提供的研究基金使我得以完成大量的研究,在我考察四川期間還得到了成都經濟研究所的熱情款待。最後,我還要感謝莎拉·巴蕾特(Sarah Barrett)非凡的編輯和打印工作以及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部在出版過程中無微不至的關心。

本書,並非關於四川經濟發展的最終結論,它僅僅是一個開頭。因此,本人願完全承擔其中錯誤及誤解的責任。

克里斯·M·布拉莫爾

1992年8月於劍橋

目錄

前言	ix
第一章 毛時代的經濟發展及其批評和四川情況	1
第二章 四川的發展記錄	29
第三章 落後的根源	59
第四章 收入分配的理論和衡量	117
第五章 區域分配	145
第六章 區域趨勢的分	187
第七章 四川的發展記錄	231
第八章 食品可供量下降和制度變化	277
第九章 饑荒	299
第十章 食品可供量下降和制度變化	325
結 論	359
譯後記	365
附錄	367
參考文獻	387

第一章

毛時代的經濟發展及其批評 和四川情況

文 獻

由於 1978 年以後越來越多的全面經濟數據得到發表，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關於毛澤東主義經濟發展的大量文獻。雖然人們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許多統計數字，但是人們承認，在最好情況下（比如 1982 年的人口普查），中國的數據，可以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的數據相比較。而且，不論有何缺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有着內在的一致性。所以大部分西方經濟學家都願意至少以此作為分析的基礎。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一些西方學者想要把毛澤東主義的經濟發展一筆勾銷，視其為徹底的失敗。然而，優秀的社會科學家卻不是這樣，他們不惜付出大量勞動，以求公正評價毛澤東主義的記錄。在這方面，卡爾·李斯金、馬克·塞爾登和彼得·諾蘭是三位傑出代表。

卡爾·李斯金（1987；1990a；1990b）對毛澤東主義時代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應有的評價。他指出，毛澤東主義的經驗證明，中央計劃經濟能夠高速增長和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1987：3—4）。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由於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農村救濟、保健和衛生制度，中國得以使人民的預期壽命超過人均收入水平相同的貧窮國家所能達到的標準。正是由於毛澤東主義大搞農村基本建設，在八十年代才能取得「改革」頭

五年的增產成就 (Riskin, 1990b: 51, 57)。毛澤東主義制度做得特別好的是，縮小了，在某些方面甚至消除了以階級為基礎的收入差別。

但是，李斯金也強調指出了毛澤東主義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大量缺點。總的來說，毛澤東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沒有能找到一條既不同於蘇聯式中央經濟計劃，又不同於市場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個基本問題反映在各方面的經濟指標中。比如，在毛澤東主義後期，人均糧食供應停滯不前，而在大躍進時期甚至遠遠低於生存必需水平 (Riskin, 1987: ch. 6; 1990a)。高投資在一定程度上被持續上升的邊際資本一產出率所抵消，這在城市工業部門中尤為嚴重。而且，整體來看，收入分配的記錄並不突出，主要是因為只注意到了農村內部和城市內部以階級為基礎的收入差別，而忽視了其他。在一定意義上，對於一個代表人民進行革命的領導集團來說，最大的失敗莫過於擴大了城鄉收入的差別，儘管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大多數年份工資被凍結，但由於工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拉大，城鄉收入差別必然隨之擴大。而且，毛澤東主義的發展戰略對於長期存在的地區間（或區域間）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儘管省際差別可能有所縮小 (Riskin, 1987: 229)，「鄉村之間的不平等無疑依然存在，甚至由於限制人口由窮村向富村流動而有所增加」(P. 237)，農村的貧困到七十年代後期仍然存在。事實上，李斯金特別重視 1978 年以後貧困的減少。

在短短七年中，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億，這真是一件值得稱頌的豐功偉績。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要改善社會最下層人民的狀況，而實際上卻往往做不到。(Riskin, 1990b, : 53)

同許多市場社會主義者一樣，李斯金在倫理上特別強調減少絕對貧困的尺度，這也正符合鄧小平本人的口號——「貧窮

不是社會主義」(poverty is not socialism)的精神。

李斯金的目的，當然是要解釋和說明毛澤東主義經濟成就中不盡如人意的一面。在這一點上他符合「調整和改革」這一八十年代初響徹中國的口號的精神。他認為，毛澤東主義的失敗部分是由於計劃不完善，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實際上不存在中央計劃(Riskin, 1987: ch. 11)。李斯金所說的這種「結構性」(structural)弊病數不勝數。最明顯的例子是，積累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過大，因而犧牲了人均消費。在重工業部門中，又忽視了能源和交通工業。服務業、商業和非生產性投資（特別是住房）也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上。但是，李斯金對「不搞全面改革，而是搞沒有毛澤東主義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同上/1987: 281）能否行得通表示懷疑。在一個日益成熟的經濟中，用中央計劃手段配置資源的難度急劇加大，這就要求實行全面改革，逐步實行更加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制度(p. 4)。

這裏並沒有多少新古典主義的東西。特別是，李斯金的分析透徹地說明，「市場」決不能充分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樣清楚的是，他認為，即使不搞全面改革，只通過完善經濟計劃，也能取得八十年代改善經濟的成就。

李斯金的分析與彼得·諾蘭有很多不謀而合的地方(1988; Nolan and Dong, 1990a; 1990b)。諾蘭認為，毛澤東主義的經濟發展路線基本上是斯大林主義式的。在這方面，他提到偏重重工業、國有工業和集體農場主導一切、輕視對外貿易。總的結果與蘇聯沒甚麼兩樣，也比不上1950年以後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記錄。可以對照的只是三十年代初在蘇聯發生的饑荒和六十年代初在中國的饑荒。中國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七十年代後期一些農村地區的嚴重貧困表明了區域不平等依然存在的程度。經濟增長率平平，許多生產率指標或者停滯

或者下降。像李斯金一樣，諾蘭特別強調，在貧困問題上毛澤東主義無所作爲。

在毛澤東時期，大多數中國農民雖然在 1949 年以後有所改善，但仍然生活在赤貧之中…… (Nolan, 1988: 10)

從根本上說，再分配只能緩和大眾的貧困。要把大眾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之上，就必須要有經濟增長。一個處在中國這樣低的發展水平的國家，必經把增長當做壓倒一切的任務。貧困中的平等，雖然也能使貧困有所減少，但並非人們最向往的狀態。(Nolan and Dong, 1990b, 129)

這並不表明諾蘭贊成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相反，諾蘭贊成的是布哈林主義的發展路綫，即依靠「强有力的」(甚至是權威主義的)國家，佔據經濟「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堅決實行貧困救濟、教育和保健。這樣一種「開明專制」(enlightened despotism)，倒是可以用來說明 1955 年以前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毛澤東主義者們再也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諾蘭比李斯金更強烈地抨擊了晚期毛澤東主義的失敗。諾蘭列舉了一系列毛澤東主義經濟計劃中的結構性弊病，如忽視交通、能源和消費等等。此外，諾蘭用大量精力研究農業部門，指出部門間貿易條件對城市工業部門有利，農產品的國家收購價格大大低於邊際成本。他據此推論，1979 年以後貿易條件變為對農業部門有利，是八十年代初農業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 (Nolan, 1988: 77-81)。但是，他並不特別看重結構性弊病，並且認為，表面上的結構性弊病實際源於體制因素。比如，由於邊際資本—產出率 (capital-output ratios) 上升，要維持可以接受的經濟增長率，就不得不提高投資率。不僅如此，高投資導致人均消費停滯，而勞動積極性又有賴於消費品供應的持續增長，結果就是惡性循環 (p. 55)。諾蘭承認，集體化並不必然

導致饑荒，也不必然在鄉村取消物質刺激，但是他認為，既然沒有哪種力量能夠忤逆國家的意志，集體化大大增加了此二者發生的可能性。而一個獨立的農民，對付國家的辦法就多得多，因而能夠避免這樣的後果。

這樣，既然農業是中國經濟中最重要部門，集體化就可以說是毛澤東主義在體制上的最大失敗了。當然其他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比如，限制農業以外的小商品生產的發展。不許發展農村工業，是農村長期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沒有這樣的工業，使國有工業也缺乏競爭壓力。所以，諾蘭認為，八十年代初的許多成就都是因為搞了非集體化，而農村工業的發展也對減少絕對貧困助了一臂之力。

馬克·塞爾登的工作與諾蘭和李斯金有許多共同點（Selden, 1988;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他羅列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各項發展成就：消除了所有制基礎上的不平等，縮小了地區間（intralocal）的收入差別，通過高積累發展了重工業，擺脫了外國統治，人均農業產量和城市人均收入略有增加，在營養和提高預期壽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這些成就被一系列失敗所抵消，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的後二十年，生活水平停留在低水平上，城鄉差別擴大，農村貧困依然存在，區域不平等（spatial inequality）擴大，工農業生產率停滯不前，服務業長期衰落（Selden, 1988: 15—17）。他還強調了大躍進以後的饑荒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毛澤東時代的成就如與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相比更是大為遜色，如果考慮到在饑荒中餓死的人數，中國的發展記錄也不能說甚麼都比印度好。

但是在某些方面，塞爾登對毛澤東主義制度的批評卻更嚴厲（同上，1991: pp. xviii, xxii）。他認為，區域差別非但毫無改觀，反而更加惡化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只有部分鄉

村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特殊照顧，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對市場機制的壓制，使貧困地區失去了許多掙取收入的機會。結果，農村不僅相對衰落，而且絕對衰落了，至少河北省饒陽縣就是這種情況。塞爾登強調了毛澤東主義政權到後期時的專制性，認為在國家一級，特別是在地方上的權力集中，使得權力可以爲了既得利益而濫用。

國家權力的集中，以及領導集團對建設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選擇，使國家的目標和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的性質成爲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對於權力上的專斷、強制和濫用沒有制度性限制……使愛國愛黨的農民成爲天災人禍的犧牲品……消滅了所有制不平等的黨，卻建立起它自己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毛澤東主義制度在口頭上反封建，然而卻極不明智地沿襲了舊制度的一些方面，迫使農民爲了免遭國家權力侵犯，想方設法保護自己（同上，282，285）。

與諾蘭和李斯金一樣，塞爾登認為，毛澤東主義失敗的原因就在於這種制度本身。塞爾登特別提到了「動員式集體主義」（mobilizational collectivism），它壓制了市場，使強制手段得以盛行。最近，塞爾登又提出，甚至 1955 年以前的經濟制度，即在毛澤東主義的蜜月時期，也不像許多人以前想像的那樣有利於經濟發展。隨着人們越來越多地了解了五十年代初農村生活的實際情況，那種認為那個時期的新經濟政策——幾乎可以說是中國的布哈林主義——一切圓滿的想法也就站不住腳了。

我們從中看到了社會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早期矛盾，隨着矛盾的發展，最後要帶來殘酷的後果。矛盾的種子早在 1949 年以前就已經埋下，體現在諸如公安力量一類的制度性因素中，肆意地、無情地鎮壓所謂的反革命，還有那種社會主義概念，把一切積累的財富都視爲剝削所得。並不是因爲毛澤東突然走錯了路，才會發生 1957—1958 年的錯誤的反右運動和完全違背經濟規律的大躍進。（同上，273）

主題和問題

在李斯金、諾蘭和塞爾登的著作中隱含着一個主題，即中國農村一些地區的絕對貧困特別嚴重，直到七十年代末也毫無改觀。無可否認，一個連最明顯的貧困——食品、衣物和住房供應不足都沒有消滅的國家仍然是個歉發達國家（不過這有多少是歸因於欠發達，是另外一個問題；見第五章）。而且，人們普遍承認，到毛澤東去世時，這種意義上的貧困仍然存在。然而，指責毛澤東主義制度在消滅絕對貧困方面完全失敗也未必完全公平。至少應該了解一下那些 1949 年以前人均收入就低於、貧困錢的縣，它們的狀況在革命後是否有所改善。在塞爾登、諾蘭和李斯金的著作中幾乎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他們所強調的是還有多少事情需要做。從區域角度討論貧困面貌的長期的改變過程是本書的目的之一。

上述著作的第二個主題是，在毛澤東主義時期，區域差別幾乎沒有縮小的迹象。甚至可能擴大了。這是一個驚人的結論，要知道，在毛澤東的一些言論中，特別是五十年代中期，多次強調要搞平衡增長（包括地區意義上的平衡增長）。相對來說，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做甚麼系統的工作，值得詳細考察。

諾蘭、李斯金和塞爾登著作中的第三個潛在主題是，中國對生活水平的非物質組成部分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當然，國家也對改善潛在能力，如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識字率等，花費了相當的精力。但是，這些潛在能力的分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裡存在嚴重問題，因為如果說某個地區預期壽命很高，那麼即使食品消費和人均收入都很低，也不能說它是貧困地區。當然，在這方面，我受到埃瑪梯爾·森的著作的強烈影響，他